

韩国社会的儒教谈论分析

— 以90年代为中心 —

崔英辰*

I. 序 言

对于我们,儒教是什么?现在我们为什么要把儒教作为一个问题?大约百年前,为使未开化的朝鲜开化所作的“近代化设计”启动以来,儒教被视为历史发展的障碍而遭到否定,而在公元两千年的今天,它却重新受到注目,其理由何在?应该如何解释在对儒教的肯定和否定两个极端之间不断摇摆的韩国社会意识结构?为了对这些疑问做出回答,探讨儒教在二十一世纪是否能够作为我们所追求的理念得以确立,本文将把主要目的放在分析“此时,此地的儒教”上。

为有效地达到这一目的,本文将分析的范围限定于1996年至2000年国内日刊报纸上登载的有关儒教的报道。其理由不仅因为这一期间的报道在因特网上检索很容易,还因为这是关于儒教的谈论最为活跃的时期。

* 成均馆大学 儒学·东洋学部 教授

II. 年代別主题

1. 现代社会与儒教的价值 - 1996年

1月, 几·索尔芒(Guy Sorman)、浦里乔夫·卡夫拉(Frithof Capra)、阿·艾姆斯(R. Ames)、李光世等西欧学者们对东方思想讨论的内容以“亚洲的时代是否在到来”、“东西方思想的接近现象”等为题刊登出来。几·索尔芒(Guy Sorman)在三十年前就认为, 儒教阻碍发展, 但仍在发挥使用。他又说, 因为文化已经发生了变化, 儒教价值观受到其他价值观的攻击, 在节节败退。对于亚洲式价值, 他说“轮廓不清晰”, 表现出否定的态度(东亚日报, 1996. 1. 18)。卡夫拉通过与西欧的传统科学及哲学做比较, 肯定了道教有机体式思维, 但却认为儒教“指导维持社会的规范、秩序的权威、官僚制”等(东亚日报, 1996. 1. 11)。

《东亚日报》1月21日的报道95年以“脱近代文明的到来和东亚的可能性”为主题在汉城召开的会议论文编辑发行了“Forum21”, 以此为中心, 整理并登载了认为用东方融合的世界观可以解决生态界的破坏、人类异化、伦理意识的丧失等现代社会病态现象的主张。通过以儒教为中心的东方思想来克服近代西欧矛盾的主张也可以在《从“士精神”中寻找二十一世纪新的思想方案》(《韩国日报》, 1996. 6. 20)、《看待东方思想的视角》、《Look East》(《朝鲜日报》, 1996. 10. 10) 等看到。

关于韩国社会残留的儒教习惯和思考方式, 价值观等的报道也很多。《传统伦理的存在—紧张的生活》(《朝鲜日报》, 1996. 6. 6) 将韩国社会定义为“用儒教的道德观武装起来的社会”。这些

报道都着重于孝、儒教的家庭教育所具的功能性方面,还把现代集团的二代继承看作是“儒教的家风”(《韩民族》,1996.12.26)。此外,因为儒教的共同体意识仍然存在,也有人提出以此为基础探索韩国式劳资共同体的主张(《朝鲜日报》,1996.10.5)。与其相反,有一篇精神科医师的短评,认为以“上命下服”为根本的儒教阻碍信息化社会发展(《京乡新闻》,1996.12.29)。

有关儒教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谈论也很引人注目。认为儒教对经济发展有积极因素的司空壹(《京乡新闻》,1996.7.15)、李廷熏(《京乡新闻》,1996.12.14)和认为儒教经济圈不可能出现的Fukuyama的文章(《东亚日报》,1996.6.28)相互对立。

如上所述,1996年有关儒教的报道可以概括为亚洲式价值、对西欧近代的解决方案、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韩国社会的价值观与习惯等。

2. IMF与亚洲式价值之争——1997年

1月2日《朝鲜日报》刊登了东亚论的主要论客郑在书的《东亚文化论》。这篇文章简明地指出了当时我国学界展开的所有关于东亚论的问题及其要点,几乎可以称为东亚论的教科书。他的文章还再次以“为什么又是东亚”(《韩民族》,1997.7.8)为题的短评发表。

此外,召开了以“东亚问学上的家族解体”为主题的研讨会,其内容以“韩、中、日问学家族解体,儒教等价值空洞化的反映”(《中央日报》,1997.10.13)为题发表。97年与儒教有关的报道中,试图从儒教寻找近代解决方案的动向很引人注目。韩永雨认为,二十一世纪向往的价值典范可以在朝鲜时代文民政治中找到,¹⁾金容

1) 《文化日报》,1997.3.10。

沃和杜维明在对话中强调指出“二十一世纪的价值观应从儒教的人本主义中寻找”(《朝鲜日报》, 1997. 7. 2)。7月8日的《韩民族新闻》报道了国际中国哲学会, 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和峨山财团举办的国际学术大会, 对从东方思想中探索解决西方文明缺陷的努力做出了评价。

97年末, 从天而降的IMF事态掀起了激烈的“亚洲式价值”之争。东亚的经济发展达到了极限的诊断由3月5日《文化日报》的“英国《Economist》志东亚经济特辑摘要”中以“宣告亚洲奇迹的结束”而作出。11月22日《文化日报》的是否是亚洲式价值的失败”, 11月30日韩民族新闻的“美国舆论戳穿‘亚洲神话’”, 及12月24日朝鲜日报的“是否是儒教资本主义的极限”等报道, 介绍了西方舆论的观点, 即认为过去三十年促使东亚经济持续发展的原动力, 也就是西欧知识分子评价的亚洲式价值及以此为基础的儒教资本主义是个虚构, 另外, 该报道也反映了国内知识分子对此的看法。

3. 对东亚正体性的探究 - 1998年

97年末开始, “亚洲式价值”之争更加激烈。从1月1日文化日报的新年访谈“应如何克服韩国危机”, 到12月31日韩国经济的“世纪末地球村纷争: 亚洲式价值之争”, 仅主要报道就刊登了四十多次, 参与的学者有庖在凤, 李御宁, 李光耀, 左承喜, 咸在凤, 宋河璟, 李镇雨, Fukuyama, Giddens, Apel等国内外人士六十余名。另外, 与其有关的拥护儒教资本主义论的有柳锡春的短评(《京乡新闻》, <儒教资本主义>, 1998. 2. 9)和杜维明的谈话。

1998年值得注意的是1、1月、12月一面批判西欧对东亚经济危机的看法, 一面对东亚的正体性进行的探究开始引人注目。其代表是12月8日朝鲜日报的“近代化反省, 东亚研究热潮”。这一报道

报导了1998年秋季书店里“今天的东方思想”，“东亚文化思想”，“东亚批评”等三本与东亚有关的学术杂志新出现的事实，并分析认为，其原因是“对急于吸收西方文明的近代化过程进行反省”，而且，“世界化与地区化潮流日益明显的现实情况下存在确立东亚地区正体性的必要性”。

对于现代社会中残留儒教价值观和习惯，大部分人持否定见解，但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要把庆尚北道北部地区开发为‘儒教文化圈’，将其发展为旅游资源的动向，庆尚北道已经发表计划，为迎接2001年退溪先生诞生500周年，将举办‘国际儒教文化节’，对被提为二十一世纪精神文明解决方案的儒教进行重新探讨。这是一种欲把儒教文化商品化的尝试。

4. 孔子之争与女权运动(Feminism)的交汇 — 1999年

在韩国现代史上，儒教从未象在1999年那样成为社会性的争论对象。它是由97年IMF事态为契机所引发的亚洲式价值之争深化到其实体——儒教的讨论，也是儒教作为推动韩国社会的原理尚且存在的例证。

这一年，在亚洲的价值，儒教资本主义，东亚论等讨论继续进行之中，金京一的‘孔子死，国方兴’的刊行成为导火索，引发了对孔子赞反的激烈论争。终于在7月7日，各家新闻纷纷登载了成均馆儒林状告金京一名誉毁损罪的报道。8月8日《韩国日报》报道了韩国汉诗协会组织声讨此书作者的竞诗会及崔秉哲教授出版名为“孔子活，国方兴”的批判书的消息，还报道了儒教方面“拯救孔子”的活动。8月20日《东亚日报》和11月18日《京乡新闻》以“厚黑列，中国人写的消灭孔子说”，“孔子神话，对虚构刨根问底的

西方学界”为题,介绍了国外“消灭孔子”的活动。此外,作为批判孔子的反批判,7月5日《文化日报》登载了题为“不要大骂‘孔子亡国’”的来信,李圭泰的“拯救孔子”刊登在9月17日朝鲜日报上。

“消灭孔子”和“拯救孔子”的两大论点又引起了“儒教论争”。《文化日报》以“儒教已是否真正死掉”为题目,五次对照性地连载了对儒教的肯定和否定见解,以作比较。

1999年末,韩国儒教学会举办的冬季学术会议“儒教与女权运动的交汇”在妇女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在学术会议召开前,各家新闻就已刊发了“儒教与女权运动能否并立”(《京乡新闻》,1999. 11. 24)、“怎样才能使儒教与女权运动和谐相处”(《韩民族》,1999. 11. 25)等报道,表现出极大的关心。学术会议结束后,女性新闻发表了姜南顺以“儒教与女权运动,关于其交汇之不可能性”(1999. 12. 18)为题的短评和李恩善题为“需要‘重新’交汇的儒教与女权运动”(2000. 1. 7)的反驳文章,形成了批判和反批判。这一主题之所以掀起巨大的反响和论争是因为亚洲式价值之争,孔子之争中儒教遭到集中炮火的部分恰是女性问题。

如以上所述,在99年,由于孔子之争,儒教之争,女权运动之争,儒教成为社会谈论的主题,这一年将如此被载入史册。

III. 儒教价值观的光明与阴影

通过对过去四年有关儒教的报道进行考察,我们认识到,儒教绝对不是博物馆的标本,而是韩国社会活生生存在的运动原理。1996年6月6日《朝鲜日报》得出结论说,从统计数字上看,韩国社

会是属于“用儒教的道德观武装起来的勤奋工作又高度紧张型的社会结构”。天主教以信徒为对象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是举行儒教式的祭祀,承认男性长者的主导权,讲究家族的排行等,表现出对儒教价值观的肯定(《东亚日报》,1997.5.18)。在旅居韩国的外国人眼中,韩国是敬老孝亲等儒教的品德尚存的社会(朝鲜日报,1996.11.17)。但是,对现实中儒教的评价呈现肯定和否定两个极端。

有关儒教机能方面的报道指出,对父母孝顺的官兵,服兵役的态度也很优秀,具有很强的忠诚心(《东亚日报》,〈孝子在军队也表现好—现役中令硕士论文〉,1996.8.8)。此外,还有已发表的研究结果表明,与父母和子女保持对等关系、保护个性的西欧式教育方式相比,教育子女对父母恭逊的儒教式的家庭教育对子女更为有益。而且,大家预测,对奉养父母的子女增加继承份额的孝道继承制度会成为解决老人问题的合适办法(《韩国日报》,〈孝道继承制度与老龄社会〉,1998.7.28)。如此看来,今天,儒教仍在将光明与阴影一起投射在韩国社会。

IV. 亚洲式价值·儒教资本主义·儒教民主主义

1. 亚洲式价值

对于亚洲经济危机,西欧经济杂志和舆论认为是亚洲的发展模式输给了西欧的市场经济,他们超越单纯的经济层次,还在亚洲式价值中寻找原因。认为亚洲之所以产生经济危机,是因为亚洲式价值不适合新时代要求的文化或价值体系。一时之间,曾被称颂为东亚

经济发展动力的亚洲式价值由于任人唯亲、关系主义、官商勾结、人情网等丑恶品德一下陷入了窘境。

西方新闻报道将舆论导向否定亚洲正体性的方向,认为“亚洲经济危机=亚洲式价值的失败”,这些报道经韩国报纸转载后,以“亚洲式价值”为核心的用语开始出现在知识分子中间。

看待亚洲式价值的视角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种。

第一,认为亚洲式价值与东亚经济危机无关。

有代表性的学者是Fukuyama。他主张,把范围广阔的亚洲看作是一个整体的前提,及把亚洲式价值当作政治、经济成功原因的观点是错误的,认为亚洲式价值导致产生人情关系和腐败,从而导致经济危机的主张也是误谬的(《朝鲜日报》,〈亚洲式价值与政治经济无关〉,1999. 6. 11)。但这并不是否定亚洲式价值本身。以日本和韩国为例,经济迅速增长,但仍在某种程度上维持了家族制度,犯罪率也没有急速增加,他认为这是儒教家族主义的正面影响(《东亚日报》,1998. 4. 26)。

第二,否定亚洲的价值。

崔章集在1998年11月29日中央日报题为“亚洲式价值是解决方案吗”的短评中,批判说,“透过被过度强调了的亚洲式价值,可以看到在共同体主义的名义之下隐藏着等级秩序和反民主的价值倾向”。他主张,必须结合韩国的实际情况,吸收并巩固人类近代史上所取得的基本的、普遍的价值体系与制度。

第三,肯定亚洲式价值的视角。

其代表性人物就是众所周知的李光耀。他批判美国的方式(system),强调基于相互义务的儒教伦理可以建立良好的家庭关系,将其发展成为国家层次上的纽带,对国家发展起到积极作用(《韩国经济》,1998. 11. 16)。虽然他的主张被公认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另一方面也被批判是为独裁权力正当化服务的政治宣传。

2. 儒教资本主义

“儒教动因论”认为亚洲式价值的实体是儒教,儒教中正面的品德成为东亚经济发展的原动力,这就是儒教资本主义论。关于亚洲式价值的争论是从否定儒教资本主义论开始的。1997年创刊的《传统与现代》触发了韩国儒教资本主义论。柳锡春在创刊号的《儒教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和极限》一文中,对“儒教能否作为西欧新教伦理的功能等价物引导东亚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了探讨。他认为,东亚儒教文明圈的国家是由继承了学者官僚结构功能的国家官僚组织起来的,其运作方式以灵活运用“血缘、地缘、学缘”等儒教式关系主义为特征。²⁾但令人疑惑的是,血缘、地缘等关系主义是否果真是‘儒教’因素。

在东亚文化论坛主办的以“儒教式资本主义”为标题的研讨会上,试图对该问题进行全面的讨论,其内容刊载在《东亚文化与思想》第2号上。此书对迄今为止的“儒教资本主义论”和将来我们所追求的经济体制既“儒教式资本主义”进行了严格的区分,在此基础上,刊登了《儒教资本主义论之形成与展开》(金弘炅),《儒教资本主义论的人类尊重与共生主义》(金日坤),《从反儒教式的资本主义迈向儒教式的资本主义》(李承焕),《试论为儒教社会服务的社会科学》(崔锡万)等四篇论文和人文、社会、自然科学等各专业人士参与的综合讨论。金弘炅首先叙述了儒教资本主义论在西方和日本、中国的形成,发展过程,然后指出,最近韩国形成的儒教资本主义论已经超出了文化保守主义的范围,带有了政治

2) 柳锡春把这称作“两种传统的儒教秩序”,他认为,“在儒教资本主义中,为了减少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企业不得不依靠国家的保证和关系网。”(<儒教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和极限>,《传统与现代》第1号,pp. 81-84.)

保守主义的色彩。李承焕首先否定了认为儒教是韩国资本主义发展主要原因的现有儒教资本主义论本身,指出韩国近代化和经济发展是彻底“反儒教的”,他分析说,人们经常谈论的对经济发展起了推动作用的“强大的政府”、“优秀的官僚集团”、“家族主义与共同体主义”等实际上是“反儒教的”;而真正的儒教精神在韩国近世史上未有任何建树,仅仅被利用为维护体制和政权安定的思想工具而已;作为新的进步的解决方案,他强调,真正的儒教资本主义是在国家和市场之间形成的自律性、道德比经济优先的特点、自我约束和节制等儒教美德发挥作用的“有人味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和金日坤提倡的“尊重人类的共生的资本主义”如出一辙。

3. 儒教民主主义

首先提出“儒教民主主义”,并试图调和儒教和民主主义的学者是咸在凤。他在1999年7月10日《文化日报》名为《崭新的话题,儒教民主主义之意义》的短评里,将儒教民主主义定义为追求仁、义、礼、智的家族的价值观,认为‘君子’、‘士’等儒家理想人物类型与民主主义完全能够结合起来。

曾一直对‘寻找我们自己的东西’持否定立场的李镇雨也主张,“从《大学》里可以发现与现代自由民主主义可以并存的德治的概念。如果向往共同体主义的儒教思想从中将已被政治思想化的社会脉络分离出来,可以克服极端个人主义澎湃的自由民主主义的极限”(《京乡新闻》,1999. 10. 27)。

对于协调儒教和民主主义的可能性,1994年时亚太财团理事长金大中在与李光耀关于“亚洲式价值”的论争里,也曾讨论过。李光耀主张,为了亚洲的发展,家父长制或终身雇佣等亚洲独特的文

化与价值更为合适。金大中理事长对此提出反驳,认为自由、人权、正义等是普遍价值,从亚洲的历史上也可以发现这种价值,并举出《孟子》“主权在民”作为例子(《东亚日报》,1999.10.17)。他对儒教民主主义国际学术会指示说,“将传统的儒教价值嫁接到民主主义上,期待着树立新世纪民主主义的发展模式”,这也可以从同一角度来理解(《每日经济》,2000.3.13)。

由此看来,金大中政府试图从儒教思想里寻找理念基础的举动很引人注目。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院长韩相震主张,“可以以儒教为基础导出领导二十一世纪亚洲的价值,可以从传统儒教里找到”第二次建国运动精神的‘根本。据说,精神文化研究院因此组成了“传统与政策研究团”,正式开始着手研究,而在2月28日的研讨会上有人提出相反论点,认为“无法赞成把充满家父长制封建残余的儒教作为理念核心”(《东亚日报》,1999.3.15)。但是,在4月4日《中央日报》刊载的、汉柏财团举办的讨论会论文中,韩院长大力主张,“亚洲的第三条路是通过‘参与民主主义’来发展儒教的人本主义思想,将伦理性赋予资本主义的方式是可能的,为此,需要可以改善政经勾结和腐败等现存问题的批判势力,即市民集团。”

儒教与民主主义的结合并非仅在理论的层次上,燃眉之急是在现实政治中它将以何种形态出现,这是令人极为关心的问题。

V. 儒教与女权运动(Feminism)

虽然时而有一些关于儒教与女权运动关系的议论,但最初在学会上公开提出这个问题的是韩国儒教学会99年11月27日举办的

名为《儒教与女权运动的交汇》的学术会议。儒教界和妇女界围绕着同姓同本、户主制等问题,事事对立,有时甚至不惜物理性的示威。女性一直被看作是儒教的最大受害者,在围绕亚洲式价值有效性的国际争论中,儒教受到集中攻击的领域就是妇女问题(《文化日报》,1999.12.7)。

“如果儒教在二十一世纪要发挥领导理念的功能,就不能再回避占人类一半的妇女问题。”儒教学会从这种问题意识出发,从儒教里提炼出主张男女和谐的原理,不仅开始构筑与女权运动相和谐及将其纳入的基础,而且开始讨论在西欧传来的女权运动在韩国落户方面,儒教可以发挥什么作用。

对于该学术会议的内容,姜南顺在给《女性新闻》的投稿中指出了将儒教与女权运动嫁接的努力所含的危险性和虚假性。她主张,儒教牢固地确立起了性别差别、身分差别等各种人类差别主义的社会、政治结构,不仅根本不可能与女权运动相交汇,而且应把它视作儒教隐藏隐密的差别结构的危险的、变形的言论。即儒教的关系主义是等级性的,男性中心主义的,所以不可能成为“平等的关系主义”的替代方案(《女性新闻》,〈儒教与女权运动,其不可能的交汇〉,1999.12.18)。

对于这篇文章,曾在儒教学会发表《儒教和女权运动,其结缘之解释学》的李恩善主张,“尽管儒教的礼以身分或性差别为基础,但为女权运动的核心价值—主体自我意识的形成作出了贡献。在努力与他者缔结关系的社会努力中形成的个体意识,已含有克服今天女权运动中个体主义极限的种子。”她认为,基督教的家长等级秩序也不比儒教差,但西欧的女性神学者们对圣经进行重新解释,找出里面隐藏的两性平等因素,用重新理解的传统来变革社会,她还提出反问“为什么我们这样做就不行呢?”(《女性新闻》,〈必须交汇的儒教与女权运动〉,2000.1.14)。

如以上的考察所示,这种争论近来发展成为少见的真挚的、建设性的讨论。如果可以将女权运动也接纳进来,成功地完善本身的理论,那么在现代社会中,儒教就将获得决定性的说服力。

VI. 结 论

九十年代将作为韩国现代史上一个划时代的时期载入史册。这个时期使大约百年前开始的“朝鲜近代化设计”告一段落。大约一个世纪前,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文明开化论者将西方文化作为新的“普遍文化”来接受,同时试图通过全面吸收西方文化来开化当时尚未开化的朝鲜。其后,韩国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增长。解放后的五十多年里,经过波澜壮阔的民主化斗争,1993年结束了军部统治,建立了文民政府。经济增长和民主化等两个近代化设计目标终于实现了。

但是,1997年冬天到来的金融危机,暴露了东亚发展模式的极限,所谓“亚洲式价值”成为新的话题。此外,亚洲式价值的实体—儒教成为社会上的争论对象。其中,《孔子亡,国方兴》与浅薄的商业主义相结合,引起了关于孔子的争论。儒教被指责为导致最近经济危机,使韩国社会陷入病态的病毒、爱滋,作为对此的反驳,有人提出了必须从儒教中寻找活路的“儒教代案论”。自朝鲜开始近代化设计以后,儒教曾被当作发展的绊脚石遭到否定,韩国的知识分子对其存亡毫不介意,而今天,作为一个话题,儒教又恢复了昔日的荣耀。

如上所述,对于我们,儒教具有积极和消极的双重性。儒教是

经济发展的动因,同时又是经济危机的主犯;既是权威主义等非民主的封建伦理,同时,又是能和民权,正义等现代民主主义并存的政治学;此外,还是完善自由民主主义弊端的替代方案;在传统社会,甚至现在,儒教是压抑女性的桎梏,但同时也提供了两性同伴者的伦理理论基础。

尽管存在这种双重的评价,在当今的韩国知识分子社会里,分明出现了试图把不但不可能并存,甚至曾经和儒教敌对的民主主义、资本主义、女权运动与儒教嫁接在一起的现象。当然这个实验具有缺陷,现在还没有摆脱谈论的水平,作为“东亚论”、“亚洲式价值”、“儒教资本主义论”等从西欧引进的外来议论,也仅停留在社会科学领域的讨论上。

但是,正如新罗的元晓,朝鲜朝的退溪,栗谷,茶山等所作的那样,接受外来思想,经过激烈的辩论过程,成功地使其扎根,这是我们的知识传统。因此,在不远的将来,具备精致的理论体系和实践力的第三替代方案会建立起来。为此,对现代社会科学的谈论,必须提供其哲学基础。本来,儒教的历史从政治、经济、伦理等现实问题出发,再深化为哲学,这能够成为一种参考。此外,在儒教思想史中,有必要对“共同体主义”进行重新解释。因为在亚洲式价值,儒教资本主义论等儒教谈论中,最成问题的就是这个问题。因为,以家族纽带感为基础的儒教共同体主义既是经济发展的动因,又是由于学缘、地缘、血缘等私人关系网导致经济衰落的“人情资本主义”的主犯,同时又被提示为克服西欧个人主义弊端的代替方案等等,这是儒教谈论的中心课题。笔者认为,特别是要具有超越人类的领域,将儒教共同体主义扩大到整个生态界的“生态学想像力”。